

凡勃伦对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

李明伟

(深圳大学 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深圳 518060)

摘要: 伊尼斯的传播研究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一脉相承,特别是受到凡勃伦及其创立的制度经济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方法论的启发;加深对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提供了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题。伊尼斯恰恰是在这些方面为媒介环境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 媒介环境学;制度经济学;凡勃伦;伊尼斯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9)05-0090-04

哈罗德·伊尼斯 (Harold Adams Innis, 1894~1952), 加拿大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加拿大经济学的开创者。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了传播技术的革命性意义, 余生转向传播研究, 以媒介偏向论为基石, 论证了媒介环境变革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动态作用关系, 开创了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媒介环境学。伊尼斯的传播研究有其经济学研究的深厚背景, 而他在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受到了凡勃伦及其创立的制度经济学的深刻影响。

一、伊尼斯:从经济学到传播学

伊尼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精力和成就都在经济学领域。1918 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1920 年政治经济学博士毕业。尔后,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一直到生命终了。在转向传播研究之前, 伊尼斯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学方面已经成就斐然。1923 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系统回顾了太平洋铁路这条大动脉的修造历史及其对加拿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这项研究吸引他进一步追溯交通运输的改善如何改变了加拿大的大宗皮货贸易。1930 年出版的《加拿大的皮货贸易》(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书写了加拿大皮货贸易中心几经变更、盛衰、跌宕起伏的宏阔历史画卷。这是伊尼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作。沿着皮货贸易, 伊尼斯踏入了对木材、矿产、纸浆等“大宗贸易”的研究领域。1940 年出版的《鳕鱼业》(The cod fisheries: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研究了国际范围内的鳕鱼捕捞和商贸交易, 论证了大宗贸易对大国外交、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影响。

在研究大宗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意义的过程中, 伊尼斯发现了交通和传播技术的关键作用。例如他发现,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开通不仅带动了美加之间的商品流通, 随之而来的还有美国的文化。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美国文化对加拿大的渗透借助的却是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纸浆。1946 年, 伊尼斯发表了《报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文, 论证了大众媒介对商品经济的影响。这是他在传播研究方面公开发表的第一个成果。伊尼斯开始把研究重心转向传播, 大量搜集传播媒介史的资料, 希望探讨传播媒介对于经济、权力和社会发展的意义。1948 年, 牛津大学邀请伊尼斯开设有关不列颠帝国经济史的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所用的讲稿后来结集出版, 这就是伊尼斯仅有的两本传播学著作之一的《帝国与传播》。

正如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所言:“伊尼斯的媒介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他的经济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背景留下的深深的印记。”^[1]遗憾的是, 伊尼斯的这种双重身份, 他的政治经济学和传播学之间的相互关联被忽略了。一些人读皮货贸易的著作, 一些人读传播学的著作。很少人两者都读。要理解伊尼斯从经济学到传播学的学术转向, 要全面深入把握伊尼斯的传播理论, 必须上溯探讨他的经济学研究。

二、凡勃伦及其制度经济学

伊尼斯的经济学研究深受索斯坦·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 的影响。1918 年伊尼斯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凡勃伦已经

收稿日期: 2009-02-27

基金项目: 2007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07JDTDXM86002)

作者简介: 李明伟(1978—), 男, 博士, 副教授。E-mail: libo782003@yahoo.com.cn

离开这所大学 13 年,但他依然是校园里广受热捧的思想大师。受环境影响,伊尼斯在芝加哥大学系统研读了凡勃伦的著作,还参与一个凡勃伦研究小组。马修·伊温顿(Matthew Evenden)说:“对伊尼斯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凡勃伦,特别是凡勃伦有关工业主义的著作,伊尼斯早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就深入研究过。”^{[21]62}切特罗姆也早就评述过伊尼斯和凡勃伦之间的关系^{[31]61}。

凡勃伦,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创立的制度经济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风行资本主义世界,直接影响了之后美国制度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包括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学派等。

制度经济学的创立,首先来自于凡勃伦对传统经济学的尖锐批驳。以新古典主义为首的传统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享乐主义的经济人。他们认为,“人是快乐和痛苦的灵敏计算器,每个经济人就像一个个渴求快乐的同质小水珠,在刺激物的推动下回来回振荡,但又不会让自己破裂。”^[4]凡勃伦批评说,传统经济学的这一假设既不切实际,又无助于社会分析。首先,消费者并非同质的、独立决策的经济体。每个消费者在决策自己的行为之前,往往先观察其他人的行为,以其他人对同一物品的使用评价作为自己判断的重要参考。其次,按照享乐主义经济人的假设,在追求享乐的理性驱动下,个人的消费决策和行为总是会保持一个均衡的状态,不会出现任何偏差和非理性的行为。比如,商品价格下降必然意味着该物品的消费增加。凡勃伦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边际效益分析,忽略了经济行为的其他驱动因素和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任何经济行为的意义,都不只局限于经济利益。况且,习俗不断在变化,制度始终在变迁。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凡勃伦的导师),却把经济和社会行为看作一个自然的、恒常的过程,去寻求这一过程的不变法则。

凡勃伦认为,经济学不能囿于经济谈经济,必须更多地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把经济学重建成一门‘进化科学’,努力追溯漫长岁月中人类的制度和习惯的复杂演变”^{[31]61}。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各种制度。制度由意识和习惯形成。意识和习惯在人类本能的推动下发展变化。本能是决定制度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理智”不过是本能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

凡勃伦对“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的独到研究,证实了他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和他所倡

导的制度分析方法的有效性。通过对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学式的分析研究,凡勃伦发现,“有闲阶级制度是从原始的野蛮阶段到未开化阶段的转变中逐渐涌现的”^{[5]8}。“有闲阶级”是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随着制度和社会的不断变化而变化。这种经济现象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传统经济学家所看重的经济意义,而在于其突出的社会意义。因为,“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提出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5]31}。而表现金钱力量从而获得和保持尊荣的有效手段,正是“有闲”和对财物的“炫耀性消费”。在传统乡村社会,“有闲”和“炫耀性消费”的社会效果大致相同。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社会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炫耀性消费”将比“有闲”更能够博取荣耀^{[5]67-68}。凡勃伦总结提出,“炫耀性消费”遵循竞争原则、歧视性消费原则、浪费原则和金钱荣誉原则。社会有一套与“炫耀性消费”相匹配的阶层结构和行为规范。人们通过这种大大超出其生理需求的“炫耀性消费”向他人表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三、凡勃伦对伊尼斯传播研究的突出影响

凡勃伦的学术革命气质及其首倡的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深深打动了伊尼斯。1929 年凡勃伦逝世,伊尼斯发表了一篇文章 *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 高度肯定了凡勃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及其所创立的制度经济学的学科价值和研究意义,并表露出了效仿和应用其理论的浓厚兴趣。

伊尼斯对凡勃伦制度经济学的效仿和应用,不仅直接体现在其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研究中,而且渗透到了他晚年的传播研究当中。综合来看,伊尼斯的传播研究受凡勃伦影响最突出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法论的启发。经济学应该是什么样的研究?取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在凡勃伦看来,传统经济学把经济活动看作一种物理现象,去发现其中的所谓“精巧装置”和“不变法则”,这完全不切实际。凡勃伦跳出经济和市场领域,在广阔的社会变迁图景中分析心理、习俗、制度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及其变化,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对经济的静态、刻板研究。这一点深合伊尼斯的学术志趣。他赞同凡勃伦对新古典经济学偏执于“计算”的批判态度。在 1929 年的那篇文章中,伊尼斯写道:“在我看来,当代经济学家都沉浸于琐细的经济学分类研究而不能自拔,马歇尔时代的经济学与 Asa Gray 时代的植物学并无二致。”^{[6]20}年后,伊尼斯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科学信仰:“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解释模式和趋势,以便能够预测未来,而不是靠精细计算为政

府和工商业提供短期的预测。”^[7]

以这种社会科学信仰为原则,伊尼斯为媒介环境学创造了独特的方法论工具,一种在大社会历史背景的宏观思辨研究。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曾经评价说:“在美国还没有其他人这么做的时候,伊尼斯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学术探讨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历史的、经验的、解释的和批判的。”^[8]伊尼斯的这种研究方法对媒介环境学影响至深,特别是被麦克卢汉视为“芝麻开门”一般的灵奇咒语。麦克卢汉曾不惜笔墨击节赞誉这种别致的研究方法:

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在此,伊尼斯并不是要推出一个视角或观点,而是要推出一种复杂机制的诊断分析。……常规的历史著作写到“印刷术的冲击”时,仅仅是告诉我们印刷量有多大,出了多少书,有多少读者。这样纯粹的数量报告是因果的匹配,而不是要去发现模式。

他以动态的态度看待过去,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他揭示了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扭转剧情,揭开演员面具之神灵^[9]。

第二,加深了伊尼斯对技术的重要作用的认知。凡勃伦认为,技术创新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力。他把人类社会分为四个阶段:野蛮时代,未开化时代,手工业时代和机器方法时代。根据凡勃伦的研究,各种工艺技术的进步不止是促进市场消费和经济发展,更主要是对思想和习惯的改变,进而推动社会制度的不断演变。凡勃伦对技术之经济与社会意义的分析和肯定,给伊尼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随着伊尼斯对加拿大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渐清晰,愈发巩固,以至于成了他晚年研究传播的主题。

20世纪20年代,伊尼斯进行了后来被誉为“加拿大史学史上的神奇经历”^[10]的四次长途田野考察:1924年和同事沿麦肯齐河;1926年沿育空河;1927年到北部安大略湖、魁北克和马里泰吾省的许多城镇;1929年到哈德逊湾。在这些实地考察中,伊尼斯发现了交通运输系统攸关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大量证据。例如,这些地区的贸易运输严重依赖河道,导致贸易往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单向流动的特征。工业革命淘汰了早期的狗拉车和木筏这些比较原始的运输方式,这些地区的贸易往来才得以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向规模化和组织化的方向发展。

对“价格体系”(price system)的研究让伊尼斯更加坚信技术的巨大作用。“价格体系”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经济学各流派对“价格体系”的角色和作用,见仁见智。亚当·斯密认为,价格体系导致了劳

动分工和技术进步。凡勃伦强调的是价格体系在文化和习俗方面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培育了金钱文化(pecuniary culture)。伊尼斯既不像亚当·斯密那样把价格体系仅视为市场变化的一个因素,也不像凡勃伦那样完全倒向价格体系的社会文化效应。伊尼斯研究发现,价格体系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引发了经济变革和社会变迁,但是价格体系的这些效用会因媒介不同而大小、强弱各异。他研究证实,“在信息能被快速传播的地区——在城市而不是郊区,价格体系会有更强烈的作用。”^[10]

大众媒体不仅因为对各种商品价格信息的快速传播而突出了价格的市场调节与配置作用,而且它们自身的低价销售策略首开商业领域薄利多销的先河(“newspapers had served as pioneers in the field of low prices and rapid turnover……”),引领工业革命后一种新型商品经济——这种新型商品经济拜工业革命所赐,以低价销售、快速流通和规模经营为特征——的发展潮流。

在市场和传媒之间,传播学研究往往视前者为自变量,来考察市场变动对传媒的影响。伊尼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用专业经济学的眼光最早对大众传媒的市场效用作了专门剖析,高度肯定了现代大众传媒在市场流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报纸是经济变革的发动机”这一理论命题。

第三,为伊尼斯研究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命题。“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伊尼斯的讨论不再仅将传播作为推动市场的动力,而是进而将传播作为一切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索。”^{[3]166}特别是,伊尼斯把“垄断”、“偏向”等经济学范畴应用到传播社会领域,倾力探讨了媒介对于知识的流通、控制,以及附丽其上的权威和权力的影响。而这些范畴多受益于凡勃伦。

例如“偏向”(bias)这一重要概念,凡勃伦在其制度经济学中已经提出,人的本能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偏向的思想意识、习俗惯例,进而形成不同偏向的社会制度,影响制度环境中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凡勃伦所谓的“偏向”是指思想、习俗及其形成的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性质特征,它源自于人类本能的推动,是制度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伊尼斯对这一概念予以了特别的重视和加工,提出了媒介的“时空偏向论”:一种媒介或者更适合时间上的纵向流传(time bias),或者更适合空间上的横向扩散(space bias)。伊尼斯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不同偏向类型的媒介突出不同性质的知识,适合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知识与权力垄断。所以,媒介环境的变革必然意味着社会经验的大规模重组和权力结

构的洗牌。

伊尼斯不仅以“媒介偏向论”启引媒介环境学的一系列研究——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论(sensory bias),梅罗维茨的场景偏向论,而且为媒介环境学确立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大历史背景的宏观思辨研

究和研究主题——媒介环境变革是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动因。伊尼斯的这些传播研究创新及其学术贡献,显然离不开凡勃伦的重要影响。这也启示我们,传播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必须重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推动其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咏华. 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57.
- [2] Matthew Evenden.The northern vision of Harold Innis[J].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1999, Fall.34(3).
- [3]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 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 曹静生, 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 [4] Veblen Thorstein.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M]. 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19:73.
- [5]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学[M]. 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6] Harold Innis.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C]. M.O.Inni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24.
- [7] 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9.
- [8] 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 殷晓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512.
- [9] 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序言)[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0] Harold Innis.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modern state [M].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46/William J.Buxton.Harold Innis'excavation of modernity:the newspaper industry,communications,and the decline of public lif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8, 23.

Thorstein Veblen's Influence on Innis' Communication Theory

LI Ming-wei

(The Center of Media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Abstract: Innis'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orstein Veblen and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e constructed on the three prominent aspects: methodology,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y, and certain crucial concepts. On just those aspects, Inni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Key words: the media ecology;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arold Innis; Thorstein Veblen

[责任编辑:孟青]

(上接第 80 页)

参考文献:

- [1] 何小锋,黄嵩. 关于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构建[J]. 学术研究,2002(2):5-9.
- [2] 张志元,陈继强. 资本运营管理中的风险与防范[J]. 山东社会科学,2004(10):58-60.
- [3] 孙淑生. 无形资产运营与协同效益[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7):75-76.
- [4] 吴世农,陈斌. 风险度量方法与金融资产配置模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1999(9):30-38.
- [5] 何小锋,韩广智. 资本市场理论与运作[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34-41.
- [6] 约翰 Y 坎贝尔,路易斯 M 维瑟拉. 战略资产配置——长期投资者的资产组合选择[M]. 陈学彬,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On the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ntangible Assets Allocation

——A View of the Intangible Assets on the Basis of Its Allocation Extending Line

XIE Hui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tangible asset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assets operation.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the rules and significance of intangible assets allocat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expansion line of assets operation. We find that intangible assets have cooperating, staged characteristics and threshold values. They can be accelerator as well as bottleneck for assets increment and their liquidity changes greatly with the price fluctuation. All these lead u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intangible assets 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market environment of intangible assets exchange.

Key words: intangible assets; tangible assets; expansion line

[责任编辑:孟青]